第 52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2, No. 6
2015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15

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
——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

陈 平 原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光荣与梦想”,最让人感怀的,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非具体的教学或科研成果。现代大学这一制度设计,给无数读书人参与抗战、保存民族气节提供了可能性。七七事变后,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又无力回天的读书人该如何自处,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绝大部分教授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南迁;至于学校承认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伪职战后被审判,其他三位(孟森、马裕藻、冯祖荀)都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气节。作为会思想的芦苇,危机时刻的选择,并不关涉“知识”与“学问”,而是“气节”与“情怀”。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所坚守的,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职责,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与信念。对比明清易代之际的读书人,抗战初期北京大学的教授,其精彩表现,更为可圈可点。

关键词: 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现代大学

中图分类号:K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6-0139-08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光荣与梦想”,最让人感怀的,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非具体的教学或科研成果。在刚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我谈及:“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① 其实,还有另一个论述角度,那就是,现代大学这一制度设计,给无数读书人参与抗战、保存民族气节,提供了可能性。

在所有内迁大学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撤退尤为艰难,因那时北平已经沦陷,只能秘密组织,积极串联,分批撤离。而离开不离开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对于很多教授来说,是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走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意味着日后颠沛流离,但不会有失节的焦虑;而留在危城中,很可能进退维谷,精神上备受煎熬。

走还是不走,在抗战全面爆发最初的那半年,是特别让人纠结的话题。这里以十位北大文学院教授为例,讲述这半年间发生的让人感叹嘘唏的故事,进而探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状态。

一、危城记

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1937 年 7 月 29 日,北平沦陷。身处危城的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到底该怎么办? 经过一番紧急筹商,在国民政府指导下,8 月间在南京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8 月底登报通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职员及学生赶到长沙报到。9 月 10 日,教育部以 16696 号令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而后便是筹经费,借校舍,招新生等。9 月 28 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10 月 18 日学生报到,10 月 25 日开学,11 月 1 日正式上课。两个月后,因战场日渐逼近,长沙临时大学向教育部请求迁址,1938 年 2 月,临大师生陆续动身,分三路赶往昆明。4

收稿日期:2015-09-01

作者简介:陈平原,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参见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 页。

月 2 日,教育部电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从政府决策以及校史叙述的角度立论。

我更关心的是,身处危城的北大教授,是如何辗转南迁的。7 月 29 日北平沦陷,虽说人心浮动,北大教授们还多次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秘书长郑天挺更是每天都到学校办公,绝不避地隐匿,直到 10 月 18 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以后就不再到校了①。至于日本宪兵不时前来侵扰,9 月 3 日更是直接进驻,中文系刚聘的助教吴晓铃只好收拾文件撤离,“他对于自己的岗位总算恪守到最后一刹那了”。罗常培 1948 年撰《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提及此事,而将近四十年后,吴晓铃本人在《可怜落照红楼影——危城追忆之一》中有更为详细的叙述②。

北平沦陷,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又无力回天的读书人,到底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极为沉重的话题。1940 年罗常培撰《临川音系跋》,称七七事变后,自己“幽居在北平,闭门谢客,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遣日”,除为维持北大残局而奔走集会,以及收听有关战况的广播外,“每天总花去 5 小时以上来写这本东西”。因为,手无寸铁的语言学教授,“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只能寄希望于学术救国了;可局势如此紧张,“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内心深处依旧很困惑③。当初北平教授中,具有罗常培这样的努力与困惑的,可谓比比皆是。由此“遗民心态”引发的伦理困境,不是三两句话能够说清的;更何况公众能否接受读书人天崩地裂之际埋头著述的自我辩解,也是巨大的未知数④。经过一番挣扎,最终罗常培等北大学人,还是选择了逃离北平,参与抗战大业。

政府的号召、校方的规划,以及学者本人的志愿,共同促成了大学内迁的壮举。除了此前的个别行动,有组织的撤离是这样展开的:10 月间,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奉派来天津接洽;10 月底款到,秘书长郑天挺将其分送愿意撤离者。最后一批离平教授 11 月 17、18 日赴天津,20 日分头南下。据《郑天挺自传》,他们这一路,先搭轮船南下,经青岛,转香港,“因粤汉路敌机轰炸,于是又坐船到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十二月十四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道南京陷落,学校又准备迁移”⑤。北大校方有组织的撤离教授计划,至此顺利完成。

这里有个情况必须说明。当初撤离时,因财力有限,北大只给教授及副教授提供南下费用;讲师以下的,需自行解决。战前北大教职员花名册中的“讲师”,一是兼职,一是专任。查 1935 年 2 月《国立北京大学核发薪金清册》,同样是中国文学系讲师,冯文炳月薪 120 元,闻一多 50 元,刘文典 75 元,因后两者是清华大学教授,在北大上课属于兼职⑥。兼职的讲师没问题,可随自己的大学迁移(如闻一多、刘文典);至于专任讲师如冯文炳等,因不在内迁人员之列,就变得很尴尬,可以说是举步维艰⑦。不过,看档案资料,似乎各院

① 参见《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387 页;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55 页。

② 参见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北大旧事》,第 153 页;吴晓铃:《可怜落照红楼影——危城追忆之一》,《居京琐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 页。

③ 罗常培:《临川音系跋》,《罗常培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5—639 页。

④ 袁一丹:《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北京大学 2013 年博士论文,未刊)第一章“沦陷北平的时空构成”第四节“读书人的出处进退”对此有精彩讨论,可参阅。

⑤ 《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 388 页。

⑥ 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0、511 页。

⑦ 因没有薪水,交不起房租,冯文炳(废名)只好暂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11 月间奔母丧返回黄梅,历尽艰辛方才到家。八年抗战,冯文炳是在家乡度过的,战后方才返回北大任教。参见陈建军、张吉兵:《抗战时期废名避难黄梅生活与创作系年》,《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 4 期;梅杰:《废名在黄梅》,《新文学史料》2005 年第 3 期。

系处理方式不一样,也有专任讲师及助教随大学南迁的,其费用如何解决不得而知。

到底有多少北大教师从已沦陷的北平跑出来,未见准确的统计。但有两个数字可以参考,一据《长沙临时大学教职员名录》,北京大学有蒋梦麟等 10 人,教授及专任讲师胡适、江泽涵等 49 人,助教 14 人,共计 73 人①。二是 1942 年 6 月调查的《国立北京大学在滇教职员同学录》,西南联大中编制属于北大的教职员共 111 人,这里包括请假在外的文学院长胡适(正出任驻美大使)以及文科研究所的特约导师陈寅恪、董作宾、李方桂等②。换句话说,无论北平时期的老北大,还是昆明时期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规模其实都不大③。对照战前北大教职员名录,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教授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南迁;至于学校承认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伪职战后被审判,其他三位(孟森、马裕藻、冯祖荀)都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气节。

关于战争突然爆发后北大教授如何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分期分批撤离北平危城,比较全面的描述,一是罗常培初刊《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 12 月)的《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一是据郑天挺晚年手稿整理而成、收入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年版《郑天挺学记》的《郑天挺自传》。现以此二文为主要线索,引入各种档案、诗文及回忆录,勾勒北大文学院教授走出或留在危城的心路历程。这十位教授,按年齿依次是:孟森(1869—1937)、马裕藻(1878—1945)、周作人(1885—1967)、胡适(1891—1962)、钱穆(1895—1990)、朱光潜(1897—1986 年)、罗常培(1899—1958)、郑天挺(1899—1981)、魏建功(1901—1980)、梁实秋(1903—1987)。选择的标准,主要是资料方面的考虑——必须有本人自述或师友的回忆文字,这样方能在某种程度上"重现"那一艰难的抉择。至于叙述,则按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

二、南下说

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对前一天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判断有误,以为只是局部冲突,7 月 8 日下午照原计划赴南京开会。在随后召开的庐山座谈会上,胡适有很好的论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奉派出国宣传抗日,并于一年后出任驻美大使。9 月 9 日,舟行长江,胡适写了一封署名"藏晖"的信给郑天挺,对诸位同人决心闭门著述深表赞许:

> 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④

据罗常培追忆,在北大同人情绪极为低迷的时候,此信曾给他们很大鼓舞。胡适日后也称:"那封信,我觉得不但私人应该保存,即在北大校史的材料中也很有价值。"⑤在这个意义上,虽没有经历危城中的痛苦与挣扎,但在同人最困难的时刻,胡适与他们在一起,还是值得夸耀的。

北大外文系教授、日后成为著名散文家及翻译家的梁实秋,时隔多年,撰写《回忆抗战时期》,提及北平沦陷数日后,他和北大政治学系教授张忠绂、外文系教授叶公超相约撤离北平,车上遇见教务长樊际昌等几位北大同事:

> 火车早晨开行,平常三小时左右可到天津,这一天兵车拥挤,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大家都又饿又累。杂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国饭店,暂时安歇一夜,第二天各奔前程。我们是第一批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界中人。⑥

辗转到达长沙后,梁实秋参加了一点临时大学的

---

① 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2、245 页。
② 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第 131—136 页。
③ 抗战胜利前夕的 1945 年 5 月,西南联大全校共有教员 395 人,职员 173 人,学生 2058 人,参见《西南联大概况调查表》,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第 69 页。
④ 此信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有节录,全信见《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712—713 页。
⑤ 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616 页。
⑥ 梁实秋:《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散文》第四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4 页。

筹备工作,很快因几位北大教授集资推举一人北上接取数家的眷属,而重回北平。这一趟旅程非常艰难,日后在《感伤纪行》及《槐园梦忆》等文中多有述及。如此耽搁,加上第二年春天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梁实秋从此与北大脱离关系。抗战八年,梁实秋除参与若干政治活动,主要工作是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尽管如此,其离开北平时的壮怀激烈,还是很值得钦佩:“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①

梁实秋没说清楚,他乘坐的,其实是七七事变后平津第一次通车,时间是 1937 年 8 月 12 日。北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以及在平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日后加入西南联大的杨振声、沈从文等,也在这趟车上。1938 年 4 月出版的《工作》第 2 期,刊有朱光潜的散文《露宿》,对整个行程有更为精细的描写:

> 由平到津的车本来只要走两三点钟就可达到,我们那天——8 月 12 日,距北平失陷半月——整整地走了 18 个钟头。晨 8 时起程,抵天津老站已是夜半。……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平举在手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稍不凑巧,拨刺一声,便完事大吉。没有走上几步路,就有五六个日本兵拦路吼的一声,叫我们站住。②

经过一番仔细的搜身,方才闯出重围。可眼前的万国桥已被封锁,无法进入法租界,只好露宿桥头。直到第二天住六国饭店的友人得到消息,将朱光潜四人接入租界,才算有了安全保证③。南下后的朱光潜,没有赶到长沙参加临时大学,而是接受四川大学的聘约,出任川大文学院长。那年九月,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朱光潜慷慨陈词:

> 这次最大的损失,我认为是在文化方面。素负最大文化使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或者已遭重大的损失,或者因已经酿成恐怖情势,也没有学生到校了。现在只有四川成都,俨然世外桃源。……我们的机会愈难得,所负的责任也就愈重大。④

很可惜,朱光潜在川大的工作并不顺利,八年抗战的主要业绩,是在武汉大学任上取得的。

史学系教授钱穆离开北平的时间,在此之后,但不能确定是哪一天。在《师友杂忆》中,钱穆称:

> 民国二十六年,双十节过后,余与汤用彤锡予、贺麟自昭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晤吴宓雨生偕两女学生亦来,陈寅恪夫妇亦来。……吴陈两队皆陆行,余与锡予、自昭三人则海行,直至香港。⑤

同行的汤用彤、贺麟没有留下任何南行文字,钱穆的叙述又语焉不详,我们只能借助陈、吴的行程来推断:陈寅恪一家挣脱各种羁绊,于 11 月 3 日离平赴津⑥;吴宓也于第二天抵达天津。大概吴宓当年并不看重钱穆,日记中只称 11 月 7 日在法租界六国饭店见到陈寅恪夫妇以及汤用彤、贺麟等,11 月 10 日“贺麟、汤用彤等……亦同乘海口舟,但直往香港”⑦。两路人马曾同乘“海口轮”,只不过到青岛后方才分道扬镳。钱穆在港小住近旬,而后转广州,再赴长沙,融入长沙临时大学及

① 梁实秋:《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散文》第四集,第 215 页。
② 朱光潜:《露宿》,《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
③ 朱光潜:《露宿》,《朱光潜全集》第九卷,第 1—4 页。
④ 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朱光潜全集》第八卷,第 567—568 页。
⑤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180 页。
⑥ 陈寅恪夫人唐筼女士所撰《避寇拾零》(见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287—295 页)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早,我们携三个小女及王妈等购得快车票出京。幸车站汉奸检查不严,车行甚快。天津东站,俗呼老龙头,出此也颇不易。我们一家总算侥幸平安出来,但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住一个女儿,王妈抱着才 4 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到天津的人,以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子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
⑦ 参见《吴宓日记》第六册,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46、248—249 页。

其后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钱穆、汤用彤等人之离平,在中文系教授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危局》中有所记载:10 月 28 日下午四时在灵境七号林宅开茶话会,商谈下一步的行动;会后两天,姚从吾从长沙来电催罗常培、毛子水、汤用彤、魏建功、钱穆、齐思和等赶紧南下。这时候,长沙临时大学的消息日渐明朗,而"日本的统制逐渐加强,学校一天比一天难维持,同人再待下去,难免拖泥带水"。于是,留平的北大同人遂陆续南下。罗文称:

> 最后在十一月十七日离开北平,二十一日同乘湖北轮从天津去香港的有我和毅生,雪屏,膺中,建功,大年,廉澄,王霖之(烈),周濯生(作仁)和包尹辅诸人。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①

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晚年在自传中也称:"十一月十七日,我离别了五个幼儿,只身和罗常培、魏建功、罗庸等同车赴津,次日又有几人走,就是北大的最后一批了。"北大同人到达天津后,北大外文系讲师、清华图书馆馆长、日后出任伪北大校长的钱稻荪赶来阻止,郑等严词拒绝。过了几天,同人聚齐,搭"湖北"轮南下②。

与罗常培的抛妻、郑天挺的别子好有一比,魏建功临别北平时,女儿正病猩红热,更是牵肠挂肚,于是吟诗一首:

> 居危入乱皆非计,别妇离儿此独行。
> 欢乐来时能有几,艰难去路怖无名。
> 文章收拾余灰烬,涕泪纵横对甲兵。
> 忍痛含言一挥手,中原指日即收京。③

对于当年无数抛妻别子、孤身南下的读书人来说,这里的"忍痛含言一挥手",无疑是共同的记忆。此前,北大方针未决,同人彷徨无地,魏建功曾吟诗"可怜落照红楼影,愁绝沙滩泣马神",临行前赠予助教吴晓铃④。

十月底的那次聚会,"留平的三十六人除幼渔,心史,汉叔,缪金源,周作人,董康和徐祖正外都决定分批南下"⑤。其中年老多病或家累重的孟森(心史)、马裕藻(幼渔)、冯祖荀(汉叔)、周作人(启明)四位,其留平是得到北大校方承认的,初期还每月寄送津贴五十元。只是日后的发展大不一样,前三位守住了节操,周作人则不幸落水。

北大史学系教授孟森,今日多以明清史专家著称,其抗战中的表现,其实更值得表彰。弟子商鸿逵为其编辑《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后者附有商鸿逵遗著《述孟森先生》,提及:"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先生留守北京大学,目睹敌人暴行,忧愤成疾,延至冬尽逝去。病中吟诗多首,痛发所感。"⑥约略同时,郑天挺撰写自传时,有这么一段:

> 临走前,我两次到协和医院看望了史学系孟心史(森)先生,他当时已患胃癌,生命垂危,但他见到我,尚以病榻日记相示。日记中无时不以国事为念,并以诗讽刺郑孝胥。临别时尚执手殷殷,潸然泪下。我往日所作清史论文,颇得先生奖饰,已感不安。今见先生如此如此,我亦深受感动,为之动容。不料两月后,孟先生即遽归道山。⑦

再往前推四十年,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中称,"十一月十四日,我离平的前三天,到协和医院向先生辞行,他给我看他近作三首讽刺

①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危局》,《北大旧事》,第 155 页。

② 参见《郑天挺自传》,《郑天挺学记》,第 387—388 页。此文据郑先生晚年手稿整理而成,文字及史料略有差错,如提及南下诸君时出现了"周作人"——实乃北大经济系教授周濯生(作仁)。

③ 魏建功:《廿六年居围城三月,女病猩红热,一家颠沛,忽又独行投南,将行再作》,《魏建功文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9 页。

④ 参见魏建功:《廿六年八月八日敌兵入北平,时北大方针未决,十月中始召同人赴长沙,将去北平有作》,《魏建功文集》第五卷,第 619 页;吴晓铃:《可怜落照红楼影——危城追忆之一》,《居京琐记》,第 18 页。

⑤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危局》,《北大旧事》,第 155 页。

⑥ 商鸿逵:《述孟森先生》,载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30 页。

⑦ 参见《郑天挺自传》,载《郑天挺学记》,第 387 页。

郑孝胥的诗,我当时就在病榻旁边把他们抄下来”,诗中有“君不见贵由赵孟何如贱,况有《春秋》夷夏辨”,老先生委托罗常培“带给南方的朋友们看看,以见我心境的一斑”①。其实,留守北平的孟森教授如何病中吟诗表达民族气节,以及怎样忧愤而死,在罗常培、郑天挺、罗庸 1939 年的怀念文章中已经提及②,只不过半个世纪后重读,依旧让人感怀不已。

相对于孟森的广受表彰,中文系教授马裕藻的故事则不太为人所知。北大人物中,“三马二沈”名气很大,其中尤为关键的,是长期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的马裕藻。这里不说他的学问与性情,就说“留平”一事。当年的助教吴晓铃日后回忆:

> 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跂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砺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③

抗战期间同样留住北平,与马裕藻多有接触的张中行,日后在文章中提及“他爱国,有时爱到有近于宗教的感情”,其中有个细节很生动:“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④

北大留平四教授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外文系教授周作人。很可惜,正是此君没能挺住,落水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抗战刚爆发,周作人多次与郑天挺等北大同人聚会,商议如何面对危机。八九月间,给南方朋友写信,既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⑤;又说“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⑥,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就在北大同人即将离平前夕,周作人写一打油诗:

>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诗后有同年 12 月 11 日的自注:“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记起,因即录出。”⑦对于曾歌吟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诗人陆游来说,记录李和儿炒栗子事,自然是寄托遥深。毫无疑问,选择了“苦住”北平的周作人,此时以及日后之多次撰文谈论李和儿的故事,既表明其天人交战的内心世界,也希望此中心迹广为人知⑧。周作人最初确实保持某种独立姿态,选择译书为业,且接受燕京大学的聘约,可 1938 年 2 月 9 日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越陷越深,终于不可自拔。

关于周作人落水经过及原因的探求,从 1938 年起就不断有文章问世。在最初的一片惊愕、愤怒、质疑声中,朱光潜的《再论周作人事件》态度最为温和,带有某种辩解成分:

> 他是已过中年的人,除读书写文之外,对事不免因循。以他在日本知识界中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明智实在是很可惋惜。

---

①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北大旧事》,第 156—157 页。

② 参见罗常培:《孟心史先生的遗诗》、郑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罗庸:《忆孟心史先生》,均见国立北京大学史学会编印《治史杂志》第二期,昆明,1939 年。

③ 吴晓铃:《北平的“钱诗人们”——危城追忆之三》,《居京琐记》,第 23 页。

④ 张中行:《马幼渔》,《负暄琐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 页。

⑤ 周作人:《致亢德》(1937 年 8 月 6 日),《宇宙风》第 50 期,1937 年 11 月。

⑥ 周作人:《致亢德》(1937 年 9 月 26 日),《宇宙风》第 50 期,1937 年 11 月。

⑦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长沙: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3—4 页。

⑧ 参见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2008 年 1 期。

> 他滞居北平的原因我想很多,贪舒适,怕走动,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说是他在北平,准备做汉奸,恐怕是近于捕风捉影。①

随着“元旦的刺客”失手,周作人没有“杀身成仁”,反而进一步陷落,先当伪北大图书馆馆长(1939),后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这个时候,远方的朋友以及身边的弟子们也都无话可说了。

三、芦苇辩

正是有感于北平陷落后周作人的处境格外严峻,远在英国伦敦的胡适,1938 年 8 月 4 日寄诗给知堂老人:

>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这首“劝驾”诗,9 月 20 日到北平,第二天周作人即作和:

>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 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②

家累重是真的(家中共九人,包括鲁迅的母亲及第一任妻子朱安女士),但最关键的还是意志与信念。说实话,即便无如此家累,周作人也未必愿意离开舒适的北平。而只要不离开北平,作为文化名人,周作人是无处藏身的。俗话说得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正如朱光潜所说,以周作人的名望,日本人肯定会“包围他,利用他”。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周作人本人不懂?当初吴宓也曾希望留在北平读书写作,1937 年 9 月 23 日,他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三立,而后与陈寅恪商谈南下事:

> 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③

陈、吴之所以不得不走,是考虑到已被日本人盯住了,留在北平,要不死难,要不落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周作人的名气远比陈、吴二位大,无论如何精心规划,覆巢之下,想保持独立与自尊,只能说是一厢情愿。改“苦雨斋”为“苦住庵”,只是聊表心情而已。大时代中人,一旦身处风口浪尖,是没有多少自主选择的空间的。

这就说到周作人对于“人”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独特理解。1937 年冬,曾在北大进修的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重来北平,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

> 一阵闲谈之后,先生说道:“法国的帕斯卡尔说过,人是思考的芦苇。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大风一来,便被吹倒了。”先生的话,好像平常一样柔和低沉,可是很庄严。④

这不是周作人第一次谈论此话题。1929 年 5 月,周撰《伟大的捕风》,其中有:“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它虚空,知道它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接下来,便是引用“法儒巴思加耳(Pascal)在他的《感想录》”的一段话,在别人是读出人的伟大,在周作人则看透人的脆弱:“只须一阵风,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了。”⑤

如何理解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 1670 年出版的散文集《思想录》中的这段话,历来见仁见智。吉川幸次郎回日本后请教专家,据说周作人的理

---

① 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初刊《工作》第 6 期,1938 年 6 月;见《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 页。

② 藏晖居士、知堂:《方外唱和诗钞》,《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 1 期,1938 年 9 月 30 日。

③ 参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 219 页。

④ 吉川幸次郎:《帕斯卡尔的芦苇》,见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著,戴燕、贺圣遂选译:《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1—122 页。

⑤ 周作人:《伟大的捕风》,《看云集》,长沙: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53—54 页。

解是对的。但在我看来,会思想的芦苇,既可能脆弱,也可能坚强。大风刮过来了,有的一吹就倒,有的屹立不动,有的踉跄了几下,最后挺住了,有的则犹豫了好一阵子,最终随风俯仰。

作为会思想的芦苇,危机时刻的选择,并不关涉"知识"与"学问",而是"气节"与"情怀"。好在兵荒马乱中,大部分北大教授做出了英勇的选择,无愧"读圣贤书"的称谓。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所坚守的,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职责,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与信念。近年学界颇有为郑孝胥、汪精卫的诗文叫好的,所谓体贴其"自我牺牲",理解其"民国乃敌国也"的立场,还有"拯世济民"的初衷,我以为不可取。大风起兮云飞扬,无法要求所有人都宁折勿弯,但不该将所有芦苇全都设想、描述成不堪一击。对比明清易代之际的读书人,抗战初期北京大学的教授,其精彩表现,更为可圈可点。

So Strong Was the Reed that Could Think — the Difficult Choices Made by the Professors of Peking University in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en Pingy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glory and dream" of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ies have been recalled with emotions by many people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t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whole country, rather than specific teaching or scientific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modern universities, it was possible for innumerable intellectua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o conserve the national integrity. What the intellectuals with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ut little capability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should do after the July 7 Incident of 1937, was an extremely heavy topic. The majority of the professors answered the call of the government to move to the south of China. Out of the four professors who were permitted by their university authorities to stay in Peiping, Meng Sen(孟森), Ma Yuzao (马裕藻) and Feng Zuxun (冯祖荀)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conserved their integrity as a scholar, but Zhou Zuoren (周作人) took up a post in the puppet government and was therefore judged and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after the war. For th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compared as the reed that could think, how to make the correct choic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was not concerned with their "knowledge" and "scholarship", but with their "integrity" and "emotion". What the intellectuals should hold fast to in that era was not only their tra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propagating the doctrine,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resolving doubts", but also their strong desire and belief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pared with the scholar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fessors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s excellent and even more remarkable.

Key words: initial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modern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管 琴)